

■著译者言

世界仍然 崎岖不平

□何帆

曾经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现在已是普利策奖终身评委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可能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记者之一。1981年他加入《纽约时报》,先后在贝鲁特和耶路撒冷跑新闻,后来曾担任报道白宫事务的首席记者。1995年之后他成为《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每周三、五见报的专栏文章被全球700多种报纸转载。他的书几乎每本都能畅销。《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是他去年4月出版的新著。我们这次翻译的是经修订之后的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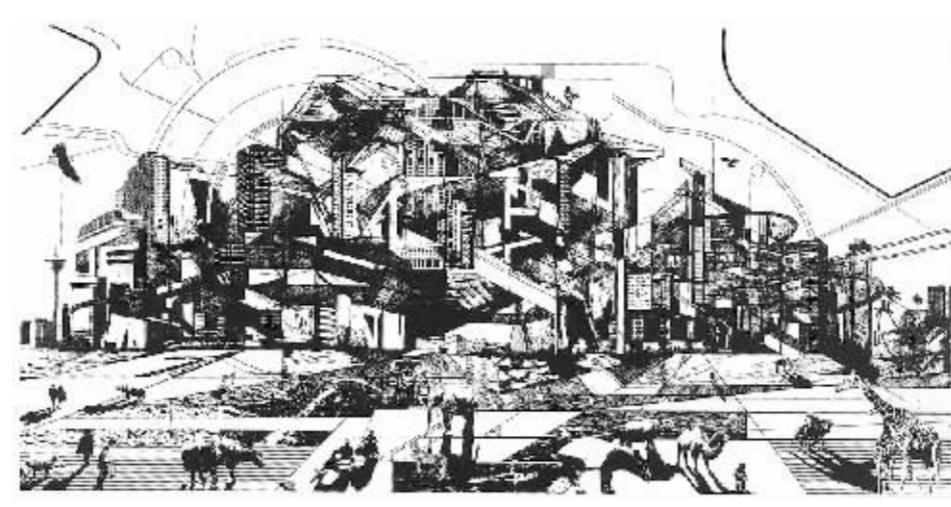
作为此书的译者之一,阅读此书是一次令人愉快和激动的经历。和学者相比,记者的见闻要广得多,而且反应非常敏锐。但是从学者的角度来看,记者往往凭借一些较浅见事就判断天下走势,在立论上往往故作惊人之语。在敬佩作者见解之犀利、阅历之广泛的同时,我想对此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历史的演变是缓慢的,尽管技术的进步可以是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决定历史变迁的仍然是海面下的潜流。制度在短期内是难以变动的,思想和信仰的成长会跨越很长的历史时期。调整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与技术的关系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我们不可能像从一扇门跨进另一扇门那样,从一个历史时期直接跨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弗里德曼出于对技术的痴迷,很多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相对不变,这使得他的有些结论过于乐观,而有的结论则多少显得天真。

尽管印度和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长迅猛,但是这两个国家仍然属于相对落后的发达国家。如果你没有到过印度和中国,而只是读过弗氏的书,你会觉得,这两个国家很快就会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你到过两国的农村和一些偏僻的地方,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有多么虚幻。况且,即使有一天中国真的超过了美国,也并非像弗氏所说的那样,只要中国搭上全球化的列车,学会利用网络技术创造的条件就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复杂

而艰难的系统改革,这些改革中最艰难的部分不是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而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克服既有的利益和阻力、寻找各个目标之间的平衡。如果说弗里德曼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只是过于乐观,那么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就显得有些天真了。在谈论为什么西方世界优于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他评判的标准是西方世界创造了更多的技术和经济增长,在谈到为什么阿拉伯世界会落后、偏执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因为阿拉伯世界里电脑、网络等技术的普及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意识形态对立、霸权国家的干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遗留的历史问题、石油资源的竞争,所有这些因素似乎在弗里德曼的视野中都被蒸发掉了。当弗氏说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错误在于不愿意正视开放给西方带来的优势和先进时,那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见跃然纸上。在谈到战争和冲突的时候,弗里德曼创造了“戴尔冲突防范理论”,并且以台湾危机为例。他认为,由于像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在海峡两岸都有投资,中国大陆和台湾均加入了全球生产链条,因此在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他显然低估了民族统一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微小的差错或误解都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冲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跨国公司和网络技术上,这种论断是令人担忧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呈指数型递增,但是这能够保证全球化的进程越走越顺吗?从最近200多年的历史来看,全球化是有起伏跌宕的。潮涨潮落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不是经济,而是人们的反应和行为。当全球化的速度过快、相应的调节制度没有到位、赢家和输家越来越对立的时候,全球化会减速,甚至也会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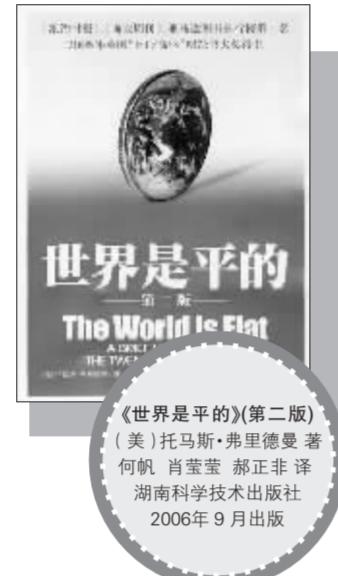
这个世界可能看起来比以前更平坦了,但事实是,它仍然是崎岖不平的。与其感叹与赞美技术进步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机会,探讨这种急剧的变化给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所带来的冲击、困惑和挑战,才是更有意义的题目。



全球化 3.0:美丽新世界?

带来繁荣,也加深鸿沟

——对《世界是平的》的另一种解读



□徐瑾

500多年前,哥伦布扬帆东去,直达西印度群岛,他向国王与王后证明地球是平的,因此史留名;今日,《纽约时报》专栏名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通过他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向我们宣告,地球是平的。

有“全球化大师”之称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分割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球化1.0版,是“国家”的全球化,始于1492年哥伦布打开新旧世界的贸易大门到公元1800年前后,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第二阶段是全球化2.0版,是“企业”的全球化,大概从1800年持续至2000年,中间曾经被大萧条及两次大战打断,其中工业革新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在第三阶段是最新的全球化3.0版,在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网时代,全球融为一个市场,劳动力和产品均可共享,肤色或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门槛,软件的不断创新让大洋两岸的人们可以通过海底光缆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3.0版的全球化让世界变成“迷你型”的同时,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力量大增的男女。——从此,地球被铲平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世界变平呢?弗里德曼总结了“抹平世界的十大推土机”来回顾透析“世界变平”的历程:“墙倒窗开”(柏林墙的倒塌和视窗软件的普及)、互联网的勃兴、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信息搜索和轻科技“内固醇”。大致看来,这十点要点多重叠,弗里德曼提示这些因素可以化为简单三点:“政治事件、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带来全球的民主开明走向,同时带来了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30亿人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加上以视窗系统为代表的科技催化下让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大市场,交易市场扩大与交易成本降低的同时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起飞。坦白说,弗里德曼的主要思想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外包以及科技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经过整合之后却是揭示了某种更为深远的社会变革图景:地球特别是西半球的一切正在被外包,无论是政治思潮,还是经济文化,都在流向新兴市场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繁荣机会。抹平的世界,也是过去垂直式的价值创造大多改变了水平式的世界。弗里德曼举了个例子,他小时候常听爸妈对他讲:“儿子啊,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跟印度的小孩没饭吃。”现在他则会给他下一代嘀咕:“女儿啊,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跟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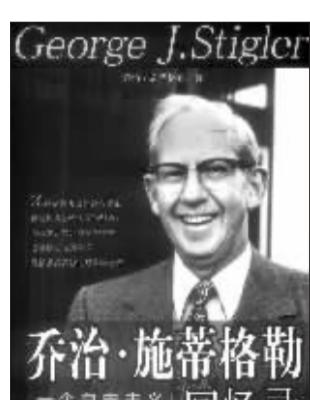
全球化最大产物与标志之一就是跨国公司,不少学者甚至觉得全球化就是企业购并国家,担心商业道德成为社会的最高戒条。但在地球变平的世纪,以跨国公司为主的企业公民也不得不改变不近人情的行事作风,比如近日IBM掌门人萨姆·帕米萨诺(Sam Palmisano)就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呼吁跨国公司必须放弃目前在本土以外业务所采取的近乎殖民的做法。他认为把研发工程留在本国,而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建

立工厂的旧式做法已经穷途末路。他认为应以新型双赢模式以避免反全球化的社会对抗性反应,这种反应会导致对大企业利益怀有敌意的政府上台。弗里德曼有一个有趣的理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多得足以能够支持得起戴尔、麦当劳这样的跨国企业,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好战。“世界上,任何隶属某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任何两国(戴尔就是象征),只要还在相同的供应链里,就不会真的开战。”

自加拿大媒介奇人麦克卢汉的天才发明“地球村”概念广为流传之后,“去部落化”的地球确实越来越小。弗里德曼则认为,世界不断缩小变平的同时,将有更多人插上插头就可以大显身手。那么变平的地球,是否意味着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全球化3.0是否会带来自由平等姑且不论,但是无疑是进入一个商业无限的时代,只要有宽带,只要有雄心,不管你在哪,都不会被边缘化。因为,竞争的立足点变平等了,小虾米和大鲸鱼可以平起平坐了。本书推出之后,弗里德曼一下跃升到和美国舆论领袖沃尔特·李普曼并肩的地位。李普曼执掌美国意见领袖50余年,但名声仅在美国,如今拜全球化之赐,弗里德曼的声望超过前辈,是属于“走向世界”一类了。

纵观全书,基本可算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一曲甜美牧歌式的赞美诗,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现代转型国家,全球化无可避免。

不可否认,在web2.0时代,全球化在带来繁荣沟通的同时边缘鸿沟也不断加深,世界对于某些人来说,永远不是平的,美丽新世界永远是遥遥不可及。但是面对全球化这样的裹挟一切大众的汹涌洪潮,除了接受应对之外别无他途,因为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现实,就要接受另一种现实。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
乔治·施蒂格勒著
李淑萍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

□汪晓波

在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中,文笔最为优美的是谁?有人说,是保罗·克鲁格曼。这位当红的美国少壮派经济学家,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还是为定期撰写的经济专栏,都能透露出其横溢的才华。如果有人问,在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家里,文笔幽默个性诙谐的人有谁,那我要

说,乔治·施蒂格勒算是一个。

在

自传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书里,无论是在叙述家庭生活,或是追忆芝加哥学派大师们之间交往的种种逸闻趣事,施蒂格勒尽情地展现了幽默的风格。

当然,

幽默的姿

态只

是

一个

表象,

这

位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家

之

一

位

得

垄断常常是一个政府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施蒂格勒的思考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最初,他是一位激进的大企业批评者,认同并支持政府反垄断政策中的一些观点——比如在某个行业,如果集中度过高,就会让人心生恐惧;大量非竞争行为的出现,最终将伤害自由市场经济本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蒂格勒渐渐发现,自己对于垄断的恐惧在减退,垄断问题的重要性也在消减,其中一个理由是,传统或者流行的观点是建立在舆论而非切实践证的基础上。

施蒂格勒并且看到,反垄断案的成本奇高,“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常常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一些人在反垄断问题上的热情,并非完全基于学术的坚持,而是有背后的利益动机。

在施蒂格勒的理解里,反垄断法成了律师们捞取好处的工具,如果反垄断诉讼胜利,受害者可以得到远远高于他们真实损失的赔偿。

一个严肃的思考者的追忆,更重要的目的自然是自由思想的白由。作为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施蒂格勒就垄断问题与政府管制行为所做的剖析,浓缩着一个经济学家的智慧,体现出其作为学者内心里的坚持。

但是他的落点在于对反垄断行为的反思,并且认为垄断不如想象中那样重要,而不是完全否定垄断行为的性质。但在兰德那里,大企业成了美国被迫害的少数民族,根本的办法是要重新审视和修改整个反托拉斯制度。不同的思考路径必然有着不同的结果,施蒂格勒的学术兴趣渐渐从垄断转向政府管制领域。这个转移,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施蒂格勒在新领域的杰出贡献,也成就了他个人的学术辉煌,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当下人的眼光来看,施蒂格勒当年在政府管制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并不炫目,许多道理似乎颇为简单寻常。但我要说,这一现象也是符合规律的——许多科学发现在后来者看来都是如此稀松平常,这完全是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环境作用的结果。

政府的角色和规模从来是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两栖命题。施蒂格勒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很鲜明,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批判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斯密要求“政府担负起唤醒或恢复国民勇气

的职责”是荒唐的。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施蒂格勒不会依赖政治学的逻辑去思考问题。他所侧重去做的,更多的是解释政府行为以及探寻政府特定政策背后的推动力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比如,关于监管政策的效果研究就很典型。

有个例子十分生动: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新发行的证券是否会显著改善投资者的收益呢?施蒂格勒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类似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他关于政府对于电费的管制等问题上。施蒂格勒坚持认为,政府的管制结果要么是对效率毫无帮助,要么是产生负面的效果,而“自由的市场机制”仍是最为有效的模式。

施蒂格勒所说的当然全都对。比如他有关垄断的思考不少人或有所怀疑有所保留,包括笔者在内。但是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所说的:“是的,我有时候会不同意乔治的观点,不过‘我愿意花时间去聆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话引人入胜和鼓舞人心’——这正是施蒂格勒的魅力所在。”

有人说,施蒂格勒的学术研究是荒唐的,但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反垄断理论,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反托拉斯政策》、《反托拉斯法》等,至今仍是研究反垄断政策的重要参考书。

■投资原典

常识和耐心

——读彼得·林奇的《战胜华尔街》



《战胜华尔街》
(美)彼得·林奇著
骆玉鼎等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出版

□中道巴菲特俱乐部 陈理

的人”,他战胜华尔街之道,我把它归纳为“八字诀”:

1. 勤奋。林奇的选股方法是“艺术、科学加上跑腿”,他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3个小时,每年行程10多万公里,连午餐都安排与公司洽谈。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他成功的秘诀是“每年要访问200家以上的公司和阅读700份年度报告”。

2. 常识。林奇不相信技术分析和股市预测,只相信生活常识。林奇第一准则:决不投资于任何你画不出来的东西;林奇第八准则:如果你爱上这家商店,多半会爱上它的股票。林奇最喜欢的投资灵感来源是伯林顿商店。他带领三个女儿去选购圣诞礼物,发现“美容小店”投资机会的故事,是林奇利用常识选股的生动写照。

3. 灵活。林奇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选股灵活多变,他说:“我从来没有全面的战略,完全是以经验主义,像受过训练的警犬一样嗅来嗅去,总可以找到被低估的股票。他在麦哲伦选择的股票主要有5种:‘中、小规模成长型公司,前景有所改善的公司,被低估的循环型公司,高收益和分红增长的公司和企业真实资产被市场低估的公司。”此外,外国股票还在基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4. 信念。林奇在本书导言中说:“不论你使用什么方法选股或挑选股票投资基金,最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种能力,即不理睬环境的压力而坚持到投资成功的能力;决定选股命运的不是头脑而是耐力。”他还说:“坚守信念跟选股不应该相提并论,但后者的成功依赖前者。”

5. 与巴菲特的不同

林奇与巴菲特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都是格雷厄姆的拥趸者,他们的方法都是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分支;都专注公司分析,抛弃技术分析,忽略宏观分析;都注重常识,只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注重上市公司调研;都偏好竞争不激烈的公司、持续增长的公司,避开热门行业;都强调安全边际原则,要求买进价格低估或合理;都强调坚持长期投资,耐心比头脑更重要;都对金融衍生品持批评态度等。

但他们不同之处也非常突出:

1. 林奇虽然也专注公司分析,但因为管理共同基金,角色定位没有巴菲特来得彻底,“股票”的色彩若隐若现;巴菲特则完全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投资(短期套利除外)。

2. 林奇是共同基金中分散投资的卓越代表,他分散投资与共同基金的规则有关,也和自己的超常勤奋有关;巴菲特是集中投资的卓越代表,研究和投资的公司比较集中。

3. 林奇的选股比较灵活,各种类型的股票都可以考虑;巴菲特选股集中在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杰出企业,即具有特许权和护城河的优秀公司。

4. 林奇喜欢频繁地做小的决定,认为每次只做小决定,即使犯错也无关痛痒;巴菲特喜欢一年只做几个大的决定,认为少决策、少犯错。

5. 林奇虽然也主张长期投资,但习惯一次买一批公司,然后很快淘汰掉表现不好的公司,每年的换手率超过100%,林奇的后悔清单中,一长串都是好公司卖得太早;巴菲特的持股长期而稳定,少数核心企业甚至被列为永久持股。

6. 林奇是现代投资的代表,进取、繁杂、灵活、分散、变化,追求资本的快速增值,投资的初衷和本质有所异化;巴菲特是传统投资的代表,稳健、简单、朴素、集中、持久,追求投资和生活方式的完美融合,符合投资的初衷和本质。

7. 林奇是“四大天王”,是张学友;巴菲特是“三高”,是帕瓦罗蒂。

1990年林奇激流勇退,宣布退休。但他的投资哲学在全球广泛传播,对基金经理和投资大众影响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林奇退休后,他的投资方法日益向巴菲特靠拢,他在享受着亲情的同时,也享受着独立投资的快乐。也许,只有内在冲动、没有外在压力的投资者,才有可能夜夜安枕、乐在其中,达到投资的最高境界。

制胜之道

有人把林奇称为“搅动华尔街